

女性新热点丛书

赵尉杰 著

裂变的 特区婚床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女性新热点丛书

裂变的特区婚床

赵尉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裂变的特区婚床
著 者 赵尉杰
责任编辑 张慕贞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2
印 数 1—10130 册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27—7/G·657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走进伊甸园

1. “你认识的文化人多,帮我找一个吧” 2
2. 觅“有一定经济基础之男士为伴” 8
3. “我不知道是嫁钱好,还是嫁人好” 12
4. “我吃什么亏,我得到了快乐” 17
5. “那我们就再续约喽” 23
6. “没有他我不能活” 30
7. “他不爱我了,我怎么办” 34

二、“围城”内外

1. 从恋爱的甜蜜到感情的陌生 41
2. 找回那份激情 48
3. 试离婚 52
4. 离开了只知“吃饱喝足”的他 59
5. 我俩“不是一种型号、一种规格的齿轮” 63
6. “何必非绑在一起不可呢” 71
7. “死亡婚姻”的解体 76
8. 交不到女朋友的书藏家 81

三、钱多就变坏的男人

1. 外面有“应酬” 85
2. 高价“买”离婚 93
3. “白开水也喝, 可乐也饮” 100
4. 找妾“续香火” 108

四、在体制和观念变化之后

1. 没人来管这些事 114
2. “我怕谁” 119
3. “空中经理”“又回到动物那里去了” 124
4. “抓紧时间补回来” 130

五、外来女性的冲击

1. “互相利用” 138
2. “公平竞争” 145
3. “合乎道德” 151
4. “走火入魔” 156
5. “三败俱伤” 161
6. “为感深圳……” 174

六、滞后的婚姻法招致的翻云覆雨

1. “没有道理”的离婚 182
2. 法律管不了的“第三者” 186
3. 婚外情带来的悲剧 195

七、女性现代化与婚姻家庭

1. 缩小夫妻间的“心理距离” 203
2. 消除夫妻间的形象反差 211
3. 跟着丈夫走进现代 222
4. 克服夫妻间的感情危机 229

5. 从外到内重新“包装”	243
八、男人离婚以后的追悔	
1. 婚好离, 情难舍	259
2. “为钱, 丢老婆, 不值”	269
3. 娶了“小婆”之后	272
九、女人离婚以后的尴尬	
1. 我“饿”, 该怎么办	276
2. 两性“互补”	281
3. “我要一个完整的家”	288
4. 缺失的爱	293
后记	301

一、走进伊甸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当我们吟咏起《诗经》中这美丽的诗句，古代先民们那活泼自在的情爱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先民们那轻快的吟咏逐渐变得低缓而沉重起来，热烈而自在的男欢女爱也逐渐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尤其是女性，她们逐渐走入不可自己言说爱情的黑暗世界，并伴随着父斥夫鞭的历史熬过了几千年。

建国后，解放的阳光同样照在中国妇女们的身上。刘巧儿那欢快的歌声已经宣示了祖国大地的所有的刘巧儿都有了“自己找婆家”的权利。但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广大城乡的几乎所有夏娃，其婚恋观念以及走入“围城”后的生活方式，也大都遵从一个既一成不变，又大体一致的生活轨迹。像当时全国人民的其他所有生活方面一样，中国夏娃们的婚恋观和婚恋方式是单元的，她们几乎完全出自相同的初衷，又几乎完全走入相同的归宿。

但特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现，使特区夏娃们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某些历史性的改变。

有人曾把特区的婚恋家庭比作一个万花筒，说是通过

这个万花筒可以看到特区生活的斑斓多姿，这话说得真是有点道理。

应该说是特区经济形式的多元，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它使特区夏娃们的婚恋观念和婚恋方式也变得空前地多元起来。

1. “你认识的文化人多，帮我找一个吧”

青年男女完全不考虑任何物质和其他功利目的的婚恋观随着私有制的诞生而一去不复返了。第一个代替它的是“世族门阀”的门第婚姻，它把女性完全变成了政治联姻和经济联姻天平上的筹码，至于女性进入夫家是在茫茫苦海还是在暗暗长夜则完全不去理会。当这种扼杀人性的婚恋观葬送了千万女性的肉体和精神后，一种与其相比较进步得多的“郎才女貌”的婚恋观便取而代之；从此，这种婚恋观成为牵扯着多少代青年男女的月下红绳。直到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从中国老大封建社会传出的旷古足音：中国民主意识这株嫩芽在中国土地上拱出地表，男女爱情也随着这足音的渐强而表现出新的态势——宝玉、黛玉那种因“志同道合”而产生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是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产生，又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即使在今天，它还放射着民主思想和平等意识的熠熠光辉。

但是，黛玉面对贾家把宝钗“判”给宝玉，自己也只能

“焚稿断痴情”。可怜的黛玉，纵有千般蜜意，万种柔情，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出闺成大礼”，孤独地哀哀而绝。

原因是什么呢？

黛玉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和政治权力，因而完全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贵族女子。

贵族女子尚且如此，贫贱儿女又能如何？

自古以来，一直处于弱者地位的女子都把改变命运的筹码押在对夫家的选择上，而对夫家经济力量的期望一直是女子借以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梦想。

她们哪里有能力敢对自己的婚姻有更高的奢望呢？

但在特区，在一群经济上相当自立的夏娃们这里，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这些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们具有着时代赋予她们的崭新的性格和勇气。

特区夏娃，若按地域来分，可以分作当地“土著”和移民女性；若按城乡来分，原本可分作城市和乡村两大类，但改革开放几年后，特区的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原来“土著”家庭里的夏娃也就和城市女性一样，或比城市女性更优越地或学或商，或工或干（部），走上了和前辈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经济生活中道路的不同，决定了她们婚恋观与前辈们的完全不同。

一次，我在深圳的沙头角采访。

沙头角这个地方，改革开放后，其声名在中国大振。社

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深圳，如果没去过沙头角，就等于没到过特区。”

何以沙头角会有如此大名？

原来这里有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街两制”的“中英街”。

我今天讲的这个特区夏娃的家就在中英街里，它归沙头角所辖——改革开放前这里是深圳的一个角落。由于比内地的建设还要相对落后，居民们的生活很苦。

这个叫佩琼的女孩 1966 年就出生在这个叫沙头角的地方，贫穷和动乱伴随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因为家穷，她只读过五年书；因为姊妹多，她辍学后不得不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带弟妹，干农活。

1979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写了这个 14 岁的女孩的命运。

佩琼的家因为就住在“国门”的边上，所以当“国门”一打开，她们家和这里的乡亲们最先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恩泽。

由于外商纷纷涌来大陆投资设厂，佩琼所在的沙头角地区的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土地改建成厂房，佩琼和村里的女孩一样进厂当了工人。佩琼聪明好学，不出几年，她就由一个工人当上了领班，又由领班当上了班长。特区改革 10 年后，她已经在不算小的合资企业里当了几年的中方管理厂长，不仅在事业上走向成熟，人也出落成一个水灵灵、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在一个晚会上，身着一套黑色晚装的佩琼在幽暗的灯光下，愈加显得妩媚动人。这真是个好少女婚嫁的最好时候。我一提起这个话题，她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我还没有男朋友。阿姨，你是记者，你认识的文化人多，帮我找一个吧！”

我觉得她提出的请求对我来说不太容易。

因为，在时下国人的议论中，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文化与钱好像不投缘：有文化的人都有点“穷酸”，而有钱的人又大多“没有文化”。

我把我的担心说了出来。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只要人好就行。我希望自己将来的丈夫和我要谈得来；谈不来，钱再多我也不干。”

20出头的少女佩琼的出语与其前辈可真大不相同了。

佩琼告诉我，她的父母家祖祖辈辈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两升的“苦出身”，在中国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国度里，他们只能是“脸朝黄土，背顶蓝天”的“庄稼汉”。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家穷得连一顶新蚊帐也买不起，这件事令母亲现在还“耿耿于怀”。佩琼说，母亲老早就告诉她，“将来找男人，就是要找个有钱的，不要找像你父亲那样的人，我和他结婚那天，他连双新袜子都没穿上，打着赤脚跟我拜的堂。”

但是母亲的“教诲”由于时移世易而没有奏效。

佩琼每月的工资收入是7000多港币，她家已经盖了两幢花园式洋楼。父母所在的原生产队现在已改变为股份公

司,每年年终每人分红也是几万元。原来一辈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钱现在对于佩琼一家已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

经济的充分自立才使人有人格的自立;对于千百年来从来经济无自立能力的女性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

佩琼已经不是一个像她母亲少女时代那样的为糊口而奔波的乡下女子,改革的大潮把她推到了一个中方企业管理人才的位置上,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她的心胸和视野都发生很大的改变,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她当然不会再像她的母亲一样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所嫁的人身上。她择偶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心理文化共同体”,“若谈不来,有多少钱我也不干。”

一位经济学家曾对男女两性组合成家庭这一人类的“创造”赞叹不已,他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真是一种最佳组合。

这位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这要从传统的婚姻功能说起。传统的婚姻,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是“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阴阳两性的组合,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是再“经济”不过的:体力互补,阳刚和阴柔互补;阴阳结合后,又可产生后代,满足“养儿防老”的生存需求。

这“经济合作社”也罢,“生育共同体”也罢,那时人们走入婚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完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自然过程,为了生存的目的罢了。“谈得来,谈不来”这样的因

容还根本无从走进男女的思想境地。因为这“谈得来，谈不来”是吃饱了饭以后人们才会想到的事情。

其实，追求情感相投、“谈得来”之类的精神“合拍”，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而它出现在像佩琼这样的女孩身上，就使我不得不想到经济的自立对于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命质量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我后来有机会又认识了许多像佩琼这样命运的女孩，她们在择偶问题上的想法与语言有些与佩琼如出一辙。

我还是要再谈到曹雪芹笔下的那个堪称绝唱的人物形象林黛玉，想到自古到今那万万千千渴望幸福、美满爱情的女子。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闪烁着高尚、纯洁情感的熠熠光辉的。但这光辉是要在当事人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情况下才能发出。像黛玉这样只能以贵族羽翼护卫的女子，也只有把自己对幸福的渴望寄托在封建家长“仁慈的”“判决”上，一旦像贾母这样的封建老祖宗处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而乱点了鸳鸯谱，她也只能在背地里暗自神伤，“焚稿断痴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中挚爱上了别人的婚床。

人类的婚姻史说明，经济能力在婚姻中常常具有首要的地位。自古至今，有多少女子，就是因为经济的不能自立，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对于婚姻，就连佩琼的母亲，这位在建国后嫁人的农家女子，当时的命运也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嫁人的目的也止于“女子嫁汉，穿衣吃饭”这样最基本的生存愿望。而“找个有文化的”，那“文化”

能当饭吃、当衣穿吗？

佩琼母女的生存质量因经济能力的不同而呈现了巨大的差异。

这差异之大，来得之快，佩琼没有想到，她的母亲也“做梦都没有想到”，特区许多和佩琼有着同样命运的女子也都没有想到。

由不得你不惊叹：时代进步的足迹有时真是大踏步的！

而受惠于这大踏步前进的历史足音的也是占人类半边天的女性。

你能不感慨时代给予她们的变化吗？

而这变化又反衬了这个时代！

2. 觅“有一定经济基础之男士为伴”

一个进入豆蔻年华的女孩，听说妈妈当年选择男友时的首要条件是“出身贫农”，十分不理解地问：“妈，我外公外婆都是大学教授，你当年为什么要找一个农民的儿子作自己的丈夫呢？”这个女孩不明白母亲当年作如此选择的时代背景。

中国夏娃的择偶标准因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远的不说，建国后30年，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当时女性择偶的首选，而这一特点又以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最。那时，夏娃们要谈婚论嫁，第一句话问的往往是：“他是党员吗？出身怎么样？”这种带有强烈时代印迹的发问已经随着那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而被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特区市场经济来临后，它又给予了生活在其中的夏娃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她在政府机关里工作，论条件，她的“硬件”和“软件”都不错。论“硬件”，她有硕士学位，这个学位在中国不能说是最高，但并不是人人都有；她的相貌也相当不错，这一点对别的事也许关系不算太大，但对于婚姻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她性情温厚，很有教养，按特区比较时髦的一句话来讲，是那种“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标准女性。这样的夏娃，会选个什么样的人作自己的丈夫呢？

她毫不讳言地对我说：“你没看到现在许多女性征婚，一句几乎可以说是必讲的话是觅‘有一定经济基础之男士为伴’，我很赞同这句话。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的爱情也很难靠不食人间烟火能够长久维持，物质生活有时会对人们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不谈别人，就以我的父母为例。他们是60年代结婚的。我常听我母亲讲，她当时稀里糊涂地跟我父亲好上了，两个人结婚后我母亲才发现，物质生活的水平有时真的会影响夫妻生活的质量，包括感情生活的质量。那时他们俩的工资都不高，全家老老小小有10口人，因此生活相当困难。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父母由

于被生活所累，不是他俩互相吵起来，就是有时把不愉快转移到我们小孩子身上。我不会怨恨父母，尤其是长大了，懂得了一些社会知识，就更理解父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养大是多么不容易。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你找对象时为什么没找个家庭经济条件稍好些的？我妈白了我一眼，说：那时哪像你们这代人，我们那时的爱情是不讲条件的，是纯洁的。——你说我们这代人讲条件爱情就不纯洁了？我不那样看。”

她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也可能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所以我对经济因素较为关注。但我觉得即使是没有我以前的经历，我在选择配偶时也会比较注重经济条件。我总觉得贫穷条件下的爱情可能是纯洁的，但也是苦涩的，在我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作我的生活伴侣呢？”

“那你不怕对方中途变心，你们的婚姻不能白头到老吗？”我问她。

“我希望爱情和婚姻都长久。我想，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也绝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愿望。自古至今，从中到外，哪对恋人不希望白头到老、永不变心呢？可真正不变心的夫妻又有几人？过去中国的女人结婚就希望从一而终，其原因是女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我来说，首先我有完全可以左右自己命运的经济能力，其次是我希望爱情长存，情感专一，但这应该是双方面的。如果其中一方有变，那另外一方又何必固守住‘专一’的信

条不放呢？我不要求我的爱人对我一定要‘从一而终’，我也没有要对他‘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的婚姻观念是一旦我们走到一起，双方都要努力维护我们的感情。”

我问她现在有了男朋友没有，她坦言告诉我，已经有了一个。我问她“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时，她笑了：“一般喽，我还是要求人好是第一位的，经济条件无止境，重要的是有在社会立足的本领才行，这也是财富啊。”

婚姻与家庭，从形式和数量上来看，就是一男一女。可就这一男一女，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却构成了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那些男欢女爱的悲喜故事也各不相同。

市场经济是一种讲究实效的经济形式，它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婚恋领域也有它的深深印迹。上面这个女性的婚恋观念在特区的夏娃中颇具典型意义：当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的所有正当需求的时候，当两性还要在一个属于“私有”的叫做“家庭”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候，在有一定条件的经济基础上谈婚论嫁，这也许对婚姻质量有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它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给予夏娃们的思维。